



南亚研究丛书·刘安武文集（六）

本文集主编 姜景奎

印度两大史诗研究

A STUDY OF MAHABHARATA AND RAMAYANA

刘安武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南亚研究丛书·刘安武文集(六)

本文集主编 姜景奎

印度两大史诗研究

A STUDY OF MAHABHARATA AND RAMAYANA

刘安武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两大史诗研究 / 刘安武著. —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000-9734-1

I. ①印… II. ①刘 III. ①史诗—诗歌研究—印度—古代 IV. ①I35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6986号

责任编辑: 曹 来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责任印制: 乌 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68315606)

网址: <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7.5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00-9734-1

定价: 43.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代序



时间只有前后 没有左右

2015年7月12日是我们的老师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刘安武先生的八十五寿诞。作为先生的弟子，我们颇有感触。想近日，先生身体渐弱，我们忧心渐起；忆往昔，先生教诲犹新，我们不敢懈怠。我们希望时间放慢脚步，不希望先生是八十五，而希望他是八十、七十、六十，希望他依然站在讲台前，希望他依然和我们一起去食堂排队……

一、先生的故事

我很幸运，成为了先生的弟子。我读本科时，北大的印地语专业是五年学制，前三年我在国内学习，后两年留学印度。由于先生不教授低年级语言课程，而一至三年级只安排了语言课程，所以前三年我根本不认识先生。四五年级有文学课程，有先生的课程，但我又不在国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本科毕业后，我师从先生读了六年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而且是一带一，大多数课程都是先生单独为我一人讲授！在这六年中，从治学到做人，我从先生那里获得了很多。参加工作至今，我依然追随先生，继续从先生那里汲取营养。

现在，先生已然耄耋，我也已知天命，但研究生生活依然历历在目，先生的教诲难以忘怀。

先生严谨，这是所有认识先生的学人甚至普通人都知道的。作为弟子，这方面的感受却又更深一层。记得那是1992年5月，得先生提携，我获准参加将于同年10月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年会，条件是必须提交论文。我自命不凡，认为写文章是小事一桩，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涂出了一篇关于诗人泰戈爾的文字，交予先生审阅。第二天，被先生叫去。我

心想，肯定会得到一番夸奖。但“天不遂愿”，先生并没有就文章论事，而是问了当时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问题：“‘1913年左右……’这种表述对吗？”我想，没问题啊，1913年左右确实发生了文章中所说的事情啊。于是做了肯定的回答。先生说：“我的意思是‘1913年左右’这个用法，不是指那件事。”我想，没什么问题啊？没等我回答，先生继续说：“‘时间只有前后没有左右’，应该是‘1913年前后’。这是常识。”啊！我的天，先生这不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嘛！我不服气！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但他不动声色，把文章递给我，说：“文章整体结构不错，但语言太粗，不严谨，得好好改。”接过文章，我连看也没看就离开了，心里自然还是不服气。回到宿舍展开文章一看，我傻眼了，先生用铅笔非常仔细地做了很多标记和改动，每页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通读下来，才发觉问题的严重性和先生的严谨程度。当时虽然感触不是很深，但隐约认识到了“时间只有前后没有左右”的道理，先生这句话的意思不仅仅指时间，而是泛指严谨的学问之道。后来写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乃至写书作文，我都愈发感受到这一“前后”和“左右”的道理。现在，这也成了我教导自己弟子的方式和案例。严谨乃学问的命脉，这是我从先生那里学到的，是我牢记终生且受益终生的。

还有一件事是我忘不了的，暂且称之为“洗碗事件”吧。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中午，上完课后，我和先生一起去未名湖边的食堂吃午饭。吃完饭后，我站起来拿起先生的碗要去洗，他连说不用，我没在意，执意要洗（那时食堂不提供如今天的餐具，就餐者自带碗筷汤勺）。结果先生认真起来，严肃地说：“给我，我自己能洗。”见我很是尴尬，他稍微缓和了一下，说：“现在我各方面都还可以，用不着麻烦你们。等将来我老了，确实动不了了，你再帮我。”自然，那次我没有帮先生洗成碗，到现在也没有帮他干过类似的事情。如今，未名湖边的食堂已然消失，北大师生也已不再需要自己动手洗碗，但这次“洗碗事件”一直陪着我，它使我更深地感受到了先生的品德。在我看来，和老师一起吃饭，帮他洗碗是件极平常的事。但先生是个不愿给他人增加任何麻烦——哪怕是洗一个碗——的人，他一向自己动手，能自己解决的事绝不麻烦他人。不过，近年来先生身体每况愈下，开始“麻烦”我了，但在“麻烦”之余，他总比较客气，甚至会有不安的表现……之于我，先生的“麻烦”实际上是一种福气，家父辞世后更是如此。但愿先生能一直把我“麻烦”下去……

教学科研的严谨以及日常生活的平实是先生的写照。正如上述两件小事所

展示的那样，先生对教学、对科研、对学生、对自己既执着认真又朴素随和。“时间只有前后没有左右”是他在教学科研领域的基本态度，这不仅是他的学术成果的写照，也为我们这些弟子的学术道路提供了基石。“不麻烦他人”是他日常生活及对人处事的基本态度。作为北京大学的文科资深教授，他有资格向相关部门要求相关待遇；作为拥有众多弟子的师尊，他更可以享受相关照应。但秉持“不麻烦他人”的信念，即便在身体已经比较差的今天，先生也很少给组织和学生增添额外负担。

二、先生的学问

刘安武先生是中国现代印度语言文学学科的第一位教授和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他1930年出生于湖南常德，上中学时就对中外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他先后就读于湖南大学、北京大学和印度的德里大学和贝拿勒斯印度大学，学习中国文学、西方文学和印度语言文学等。他学业优异，所获颇丰。完成学业后，他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进行科研工作。他辛勤耕耘，甘愿坐“冷板凳”，在三尺讲台和一方纸墨之间默默奉献，一千就是50多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数十年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先生涉猎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①对印度文学，特别是对印地语文学整体的研究；②对印地语作家，特别是对普列姆昌德的研究；③对印度两大史诗的研究；④对印度神话的研究；⑤对泰戈尔的研究；⑥对中印文学比较的研究；⑦对其他相关方面的研究。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先生翻译、写作、编选全方位出击，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和教学中。到目前为止，他已有研究专著8部、译著31部/篇、编著18部/套、论文65篇。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介绍和评价了印度文学和文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填补了国内许多项研究空白，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为后辈学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学术资料。此外，在治学态度和钻研精神方面，先生也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榜样，给后辈学人以很大的鼓舞。

在科研中，先生一向重视掌握第一手材料对研究外国文学文化的作用。他从不说不根据的话，从不写未经自己考证的文章。季羡林先生在为先生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一书做序时曾写道：“他在写本书时，读了大量的原著，参考了大量的印度学者的专著。多方推敲，仔细核对，绝不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确，先生对这本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阅读了书中提及的许多作

品，翻阅了大量的印地语第一手资料。该书始写于1958年，到1983年才完全脱稿，历时25年。由此可见先生十分严谨的做学问的态度。《印度印地语文学史》是对印地语文学系统的介绍和评价，是国内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印地语文学史。该书深入浅出，既全面又具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印度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在撰写《印度印地语文学史》的同时，先生还翻译了印度著名印地语文学史论家西沃丹·辛赫·觉杭的《印地语文学的八十年》。这是印度人系统介绍现代印地语文学的很有影响的著作，是先生在众多同类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奉献给中国读者的经典。先生认为，介绍外国的东西要有选择性，不能良莠不分。这是对读者负责的非常真诚的治学态度，是后辈学人的学习楷模。他与季羨林先生等合著的《印度古代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和《简明东方文学史》等也反映了他的这一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不仅是这三部文学史的主要作者之一，而且是其主持编写人；他不仅认真完成自己所写的部分，还负责所有事务性工作及全书的编辑统稿和最后审稿等工作。他抱着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不求名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夫不负有心人，这些著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效应，得到普遍好评。除专著外，先生在对印度文学整体性研究方面还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如《印度文学》、《中世纪印度文学》、《中古印度文学》、《印度神话传说和文学》、《印度印地语文学》、《汉译印度文学》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对印度文学进行了评介，既是专业研究者可以直接借用的资料，也是非专业人士了解印度文学整体概貌的宝贵材料，更是对中国印度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在对印度文学的研究过程中，先生对不少具体作家给予特别关注，对他们进行了专题性研究。苏尔达斯和杜勒西达斯是印度中世纪的两位重要诗人，是虔诚文学时期的代表作家。其作品《苏尔诗海》和《罗摩功行之湖》（一译《罗摩功行录》）是最有影响的虔诚文学作品，不仅是印度文学的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也是印度教经典，对印度教民众有很大影响。先生没有忽视这两位作家，他在查阅了很多材料和研读具体作品后写出了《十六世纪印度大诗人苏尔达斯》、《苏尔达斯和他的〈苏尔诗海〉》和《印度中世纪大诗人杜勒西达斯》等长篇论文，对苏尔达斯和杜勒西达斯做了科学评介，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客观介绍和点评。耶谢巴尔是印度现代印地语作家，他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较大，属于印度进步文学的代表作家。先生对该作家很感兴趣，不仅在《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一书中对他进行专节重点介绍，还专门撰写了论

文《战士——作家》，对耶谢巴尔进行了肯定性评价。伯金是现代印地语诗人，他以“吟酒诗人”著称，先生的《吟酒诗人——伯金》一文是对伯金及其“吟酒”诗歌的全面论述。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其署名作者毗耶娑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存在与否、是否真是史诗的作者等都无定论。先生对这一问题也很有兴趣，论文《毗耶娑评传》就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所得。

在对印度具体作家的研究中，先生对普列姆昌德情有独钟，他对这位作家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普列姆昌德是印巴分治前的印度著名作家，被誉为“小说之王”。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先生陆续翻译了普列姆昌德的多部作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新婚》、《如意树》、《割草的女人》、《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等。《普列姆昌德论文学》是他和另一位北大教员合作翻译的普列姆昌德论文集，该论文集收录了普氏有关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许多有价值的文章。他还写有论文《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普列姆昌德的文艺观》、《普列姆昌德和鲁迅的短篇小说创作》、《留得清白在人间》、《〈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前言》，以及专著《普列姆昌德和他的小说》、《普列姆昌德评传》等。专著《普列姆昌德评传》洋洋35万言，是他对普列姆昌德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对普列姆昌德的爱和崇敬划上的完满句号。需要指出的是，有关普列姆昌德生平和创作方面的详细资料很分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学者对此也常感手足无措，但先生通过大量的阅读、查找，搜集到了最为准确和全面的宝贵资料，做到了普列姆昌德的同胞也难以做到的事情。巴基斯坦的一位普列姆昌德研究者曾来北京大学进修，她因为本国这方面的资料很不全面，因此向先生请教了关于普列姆昌德的诸多问题，并获得了自己以前从没有接触过的材料。

先生为什么如此厚爱普列姆昌德呢？《普列姆昌德和他的小说》中先生自己的一段话可以回答这一问题：

“如果说，作者（指普列姆昌德）的反帝反封建的创作反映了他的立场是广大人民群众立场的话，那么，从作者批判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腐朽或落后的意识形态来看，那他的立场则是工农下层劳动群众的立场了。作者总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一边，总是站在受侮辱受损害者的一边。在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上，在弱者面对强者的情况下，作者总是同情和支持前者，而憎恶和反对后者。作者是真善美的卫士和辩护人。”

这段话同时也是先生自己的人生观写照。他不仅研究普列姆昌德的作品，

也研究普氏为人的高尚品德，他希望这种品德能影响后人，能发扬光大。这正是先生介绍、研究和热爱普列姆昌德的真正用意所在。

《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是印度也是世界著名的两大史诗，但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却非常不足。先生十分清楚自己作为印度文学研究者的职责，很重视对两大史诗的研究。季羡林先生在1980年为《罗摩衍那·森林篇》所写的《本卷附记》中曾说，自己在翻译《罗摩衍那》的过程中有时需要查看印地语对照本，并感谢刘安武先生在这方面给予的帮助。因为早在20世纪70年代，先生就开始涉猎两大史诗了。要研究两大史诗，就得有恒心去苦读。国内一位非常著名的印度学学者曾断言，也许有人（指中国人）仔细读完《罗摩衍那》，但绝没有一个人读完《摩诃婆罗多》。先生决心改变这一状况，经过长时间的潜心阅读，他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成为真正认真仔细读完两大史诗的中国印度学学者。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并不只是简单的阅读，他每读完一个章节，都要认真做笔记。他的笔记中包括内容摘要、个人感想以及与前面内容相关的必要统计、呼应等。可以说，先生对两大史诗非常了解，对其中的事物、事件及矛盾之处了如指掌。就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言，先生先后发表了研究论文《黑天的形象及其演变》、《世界最长的史诗——摩诃婆罗多》、《试论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妇女观》、《毗湿摩和迦尔纳》、《艺术化了的伦理道德意识——〈罗摩衍那〉的一种倾向》、《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战争观》、《剖析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正法论》、《人和神的生与死》、《罗摩和悉多——一夫一妻的典范》、《关于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国家观》等。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对大史诗做了探讨、评价，发人深省。2001年出版的专著《印度两大史诗评说》和《印度两大史诗研究》是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总结，是国内这方面极少的高水平学术专著。此外，先生还主持编写了《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该书收集了印度、德国、苏联、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印度学学者对印度两大史诗的研究文章50多篇，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有人说，印度没有历史，只有神话。这有一定道理。纵览印度古代文献，很难找到一部确切的印度历史著作。而其神话著作却非常发达，从“四吠陀”到两大史诗，从“往世书”到虔诚文学作品，有关神的著作比比皆是。因此，不少印度学研究者对印度神话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心血。先生也不例外，他在这方面也有很大兴趣。实际上，他对两大史诗的研究也是对印度神话研究的一部分。另外，他曾研读过印度最古的“诗经”《梨俱吠陀》的“梵语-印地语”

对照本，对“往世书”也有过专门的探究。他撰写了论文《印度神话中的三大神》、《黑天的形象及其演变》、《印度神话传说和文学》、《毗耶娑评传》和《人和神的生与死》等，2006年出版的《东方民间文学概论——印度民间文学》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结晶和成果代表。

前面已经说过，先生具有扎实的中国文学功底，因此，他有足够的能力涉足“中印文学比较”这个领域。他的专著《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其中有《印度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某些异同》、《中国的重史轻文与印度的重文轻史》、《〈云使〉和〈长恨歌〉》、《〈沙恭达罗〉与〈长生殿〉——兼论历史题材的作品》、《从〈西厢记〉中的红娘说起——中印爱情戏剧中的婢女与女友》、《诅咒·咒语·真言——印度神话和〈西游记〉比较》、《观音的前天和昨天——观音来东土的前后》和《成长在西天定居在东土——阎王形象的塑造和演变》等重要篇目，从宏观到微观，从形式到内容，以神话、爱情、历史、战争以及文人作家在社会中的地位等主题为基点，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印两国文学的共同点和差别之所在，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兼具，具有极强的历史厚重感。

泰戈尔是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世界级的文学家。24卷本约900万字的《泰戈尔全集》是先生在泰戈尔研究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先生不仅是该套书的主编之一，还积极参与了翻译工作。其中的剧本《国王和王后》、《拜贡特的巨著》、《天堂的笑剧》、《国王》、《邮局》、《南迪妮》、《独身者协会》、《太阳女》、《时代的进程》和《邦苏莉》等都是他的译作。先生还为《泰戈尔全集·戏剧》写了长篇论文《关于泰戈尔的戏剧》，为《泰戈尔全集·散文》撰写了长篇论文《关于泰戈尔的散文》，每篇都有2万余字，全面介绍和评价了泰氏的戏剧和散文创作，重点点评了其中的名篇。不难想见，《泰戈尔全集》的出版使中国的泰戈尔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印度学研究。从这一层面上说，先生等人在这方面的工作非同凡响，意义重大，是泽被后世的举措。

除上述专题性研究外，先生还在其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在印度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还有：主编或主持编写了《印度现代文学研究》、《印度民间故事集》、《印度古代诗选》、《印地语—汉语辞典》（合作编写）等，与他人合作翻译了长篇小说《秘密组织道路社》、印度诗选《孟加拉母亲》，独立翻译了《印度民歌》、《偷半个卢比的贼》、《她说过》、《司法大臣》、《生与死》、《获取荣誉的途径》、《不可接受》、《接受》等散篇文章（诗歌、短篇小说），撰写了关于

《佛本生故事》、《五卷书》、“中古南亚文学”和“苏尔达斯和杜勒西达斯”等方面的教材，以及《〈印度民间故事集〉后记》、《〈孟加拉母亲〉前言》等文章。这些成果虽然比较分散，也没有形成系统，却是先生印度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先生不仅在印度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整个东方学的研究领域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曾经参与编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两部巨著，并分别担任前者“南亚文学分支”和后者“亚非戏剧分支”的副主编。他还是《东方文学作品选》、《简明东方文学史》、《东方短篇小说选》、《东方文学名著题解》、《东方文学辞典》和《东方文学史》的副主编，并主持实际工作。《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词典》（亚非拉部分）、《南亚西亚散文选》、《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亚非外国文学简编》、《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选》（亚非拉部分）也是由他选编的。正如前面所说，在做这类工作的时候，先生一向任劳任怨，孜孜不倦，严谨求实，工作甘人先，名利甘人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先生的积极参与，如果没有他的这种不图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上述著作很难有今天这样大的影响，甚至很难问世。

此外，先生还担任过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学术职务。在他担任副会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季羨林先生事务繁忙，加之年事已高，研究会的日常工作都是在先生的主持下进行的；亲任会长之后更是如此。对于研究会每两年一次的年会组织、筹款等事务，他事必躬亲，不惜精力和时间，努力做好每一件事，使同行学人有一个基本的归属感，在印度学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先生对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事务也很热心，他多次参与并组织了这两个机构的会议，在印度学以外的领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三、先生的期望

刘安武先生既是一个作风严谨的学者，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师长。1958年从印度学成回国后，他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为本科生开设“高年级印地语”、“印地语文学史”等课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又担负起培养研究生的重任，先后开设了“印度文学史”、“印地语名著研读”、“两大史诗研究”和“普列姆昌德研究”等专题性课程。1988年，他培养出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首批印地语文学专业的硕士。1996年，中国第

一位印地语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也在他的指导培养下顺利通过考核，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培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先生还抽出时间和精力培养了好几位“国内访问学者”，这些学者都是国内其他大专院校的青年教师，分别来自江苏、天津、湖南、河南、辽宁等省市，因慕先生之名投入到他的门下。先生培养出的学生在国内外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不少人成为某些领域的专业骨干、学术带头人或单位领导，为中国的印度学、东方学研究和国家建设贡献着自己的所学和力量。

先生对后辈学人一向十分关心。在被问及对后辈学人的期望时，先生说，首先，做学问要实在，要做实实在在的学问，不能以虚代实。其次，先生希望后辈们在科研工作中不要急功近利，要深入研究，不能在匆忙中得出不适当的结论，或者为了出成果而忽视研究对象的深层次的本质东西。第三，先生告诫我们，做学问要甘于坐冷板凳，甘于清贫，甘于在享乐方面为人后。他提醒说，凡事得从大局出发，以多为社会做贡献为原则，不能以个人利益为重。第四，先生希望后辈学人能以老一辈优秀科研工作者为榜样，尽一切力量，努力搞好本领域的科研工作，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生对我们的殷殷之情，可以看到先生对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和东方学研究所抱有的希望。

归根到底，先生是印度学研究者，他对目前中国的印度学研究状况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力量不足，后辈人才较少。他认为，中印都是大国，其文化是两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类型，它们自古以来就一直进行着交流。我们绝对没有理由中断这种交流，应该沿着前辈们的足迹走下去。因此，他希望印度学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要有一种责任感，要把这种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而且要进行得越来越好，要力争取得更大成就。

今年，先生已经85岁了。我们——先生的学生——唯有牢记先生的教诲，用先生的所教来回报印度学研究、东方学研究和我们的社会，才不负先生的期望。

是为代序。

姜景奎

初写于2010年5月27日

修改于2015年9月27日

目录



代 序 时间只有前后 没有左右.....	1
中国读者如何理解和欣赏印度两大史诗.....	1
有关印度两大史诗的作者、创作年代和过程等问题.....	17
《罗摩衍那》的故事梗概	28
艺术化了的伦理道德意识	
——《罗摩衍那》的一种思想倾向.....	43
罗摩和悉多	
——一夫一妻的典范.....	52
《罗摩衍那》的国家观	63
论罗什曼那和婆罗多.....	73
《摩诃婆罗多》的故事梗概	81
《摩诃婆罗多》的正法观	119
《摩诃婆罗多》的战争观	132
《摩诃婆罗多》的妇女观	143
《摩诃婆罗多》中的民主意识	154
黑天的形象及其演变.....	165
毗湿摩和迦尔纳	
——《摩诃婆罗多》中两个人物形象的剖析.....	176

论《莎维德丽传》·····	186
印度两大史诗对后世的影响·····	194
印度国内外部分学者评两大史诗·····	214

附 录·····	243
----------	-----

附录一 刘安武先生简介·····	245
------------------	-----

附录二 刘安武著述目录·····	247
------------------	-----

附录三 参考书目·····	253
---------------	-----

索 引·····	255
----------	-----

编后记·····	259
----------	-----

中国读者如何理解和欣赏印度两大史诗

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已经20世纪或正在介绍给中国读者。《罗摩衍那》由季羨林先生翻译，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八册出齐。《摩诃婆罗多》的散文体译本从1994年开始出版。必须说明的是，这两个译本版本的原本都是印度20世纪经过许多学者共同努力，对照不少传统本而整理出来的精校本，其精确性和科学性是无可怀疑的。印度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还是各地流传的传统本，普遍接受精校本还不是短期能完成的事。

印度两大史诗产生距今至少1500年了，很可能已经有2000年或更长的时间。意思是，在相当于中国的汉朝就有篇幅这么庞大的作品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是印度人民对世界文学的宝贵贡献。《摩诃婆罗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这个称号将被永远保持下去，因为现代整理出即使再长的长篇叙事诗，因为创作史诗的时代早已过去，在世界文学中最晚的史诗也是几百年前的作品。

各种传统本《罗摩衍那》大约有2.4万颂。精校本近1.9万颂，这主要是删掉了重复的部分。各种传统本《摩诃婆罗多》号称有10万颂，其实有少的9.5万多颂，多的达10.67万颂。还有许多本子的数目介于这两者之间。精校本则是8.2万多颂。真正10万颂的《摩诃婆罗多》是不存在的。

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欣赏这两部伟大作品，有必要对某些问题进行澄清或加以说明。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算得上是一桩盛事，这种交流持续了近2000年，而且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是空前的。但是今天，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印度，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20世纪以前，从印度传过来的只是佛教以及和佛教直接有关的大量典籍，即印度的一部分文化，还不是印度最重要

的部分，更不是印度的全部。1992年8月22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唐非先生访问印度后写的文章《女人、宗教和庙》有一定代表性。唐非先生写道：“先前，我们以为印度是个佛教国家。这次才弄明白，佛教在印度产生、发展并且传播到海外之后，到公元8世纪左右逐渐衰落而被印度教所代替。”唐非先生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人，尚且如此，那老百姓便不必说了。徐庆华先生在其所撰《印度西瓦立克山，你是否埋葬着人类最早祖先》一文中说：“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位于印度西北部的西瓦立克山区，人们不时从古老的地层中挖到像人那样的颌骨和牙齿化石。这对佛教盛行的印度居民来说，无疑会充满着神秘的迷信色彩，把它们看作是神灵的遗骸。”（1999年2月1日《北京晚报》）徐庆华先生仍把印度当作佛教盛行的国家。实际情况是，自玄奘到印度取经后，印度的佛教开始走下坡路。在十一二世纪后，遭到入侵的伊斯兰教民族的打击，更为衰落。应该说，不仅印度教的势力，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的势力，取代了原佛教的势力。

为什么说，佛教和佛教文化不是印度最重要的部分呢？我们知道，印度的印度教历史更为悠久，影响更为深远，而其积累的文化典籍更为浩繁和重要。印度教的前身是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存在了，它有所谓“祭祀万能”“吠陀天启”和“婆罗门至上”等是其最重要的准则，它把人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等四大种姓。佛教在公元前5世纪兴起，是作为婆罗门教的对立面出现的。佛教反对种姓，反对婆罗门至上，也不同意吠陀天启和祭祀万能。这样，它吸引了许多婆罗门教信徒，甚至包括婆罗门种姓本身的一些人皈依它，于是佛教兴盛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但是全面来看，即使在这几百年上千年的兴旺时期，其势力也没有超过婆罗门教。这就像亚洲某一个国家翻译了中国老子的《道德经》，在该国流传较广，就认为中国的道教是中国的国教，或者说中国人主要信仰道教，同样可笑、片面。应该说儒教（儒学）才是中国主要的意识形态，道教只是局部的，不能把局部当全部，也就是说，尽管道教在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很盛行，信仰的人很多，但从总体来看，只是局部。公元八九世纪，婆罗门教经过宗教大师商羯罗的改革并吸收了佛教的某部分成为印度教后，佛教却没有更新，与印度教的区别逐渐缩小，所以它独立存在的意义也越来越小，何况遭到伊斯兰教的致命打击呢。

那么为什么佛教得以传入中国，而印度教却没有传入中国呢？因为佛教反对把社会上的人分为四个种姓的这种血统论，佛教提倡众生平等。中国没有种

姓，各个阶层都可以信奉佛教，而印度教传入中国却没有这个基础。它不可能在中国社会里制造出四个种姓来。也许有人会说，那印度教为什么传入爪哇、苏门答腊、斐济、圭亚那、毛里求斯等地区和国家呢？那正是因为那些地区和国家有大批的印度移民，这些移民带着种姓制到那些地区和国家定居并生育后代，这样以血统为基础的种姓得以延续，故印度教得以存在。

印度的佛教徒似乎更热心于经典的创作，比较热衷于对教理、教规、教义的阐释和发挥。对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和创作方面远不如印度教徒。在佛经的所有典籍中，真正的文学作品并不多。《佛本生故事》《佛所行赞》等是一些佛教色彩很浓的文学作品，当然许多佛教经典中都是一些小故事、寓言或童话，作为经、律、论的佐证。显然，收集和加工这些民间故事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以宗教为目的。中国人那么热心翻译佛教和带佛教色彩的典籍，为什么不翻译两大史诗以及其他印度教的文学作品呢？道理很简单，他们是出于宗教目的，不是出于文化和文学交流。他们认为是异教徒的东西，与本教格格不入，或者说根本排斥异教徒的优秀文化、文学遗产。这是他们的局限。任何宗教都具有排他性。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已知印度两大史诗。其实这是夸大其词。从佛教典籍或佛教徒写的著作中知道两大史诗的名字不等于知道两大史诗。直到许地山的《印度文学》才稍稍介绍了一些，这已经是20世纪的事了。所以，总的来说，在20世纪以前，中国人只知道印度有两大史诗，但具体内容是什么是比较模糊的。从介绍故事情节，到介绍缩写史诗的材料，到全文译出，这是20世纪下半叶的事。

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分别评价作为宗教经典的文学作品或作为文学作品的宗教经典。本来作为宗教经典或文学作品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事，宗教经典有宗教经典的评价标准，文学作品有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但问题出在既是宗教经典又是文学作品该怎么办？一般说来，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对《旧约圣经》的评价不可能一样，伊斯兰教徒和非伊斯兰教徒对《古兰经》的评价肯定有很大的不同。同样对两大史诗，印度教徒和非印度教徒评价大有区别，这是由于宗教感情的缘故。

一旦宗教信徒讨论到他所信奉的经典，他的虔诚宗教感情必然渗入到他的思想之中，或者说体现在他所论证的题目当中，他不可能客观地评价这部已上升为宗教经典的文学作品，采取对纯文学作品的办法去公正地进行判断。就以